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热点透析

G20中国峰会：探寻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

□ 张仕荣

2016年9月，G20中国峰会将在中国杭州举行，这是今年中国多边外交和主场外交的重头戏。2008年以来，G20峰会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发挥了关键作用。2016年，世界经济又到了一个新的节点，如何探寻到全球经济新的增长动力？摆脱世界经济低迷状态的路径在哪里？国际社会怎样实现协调一致？全球正在把目光转向中国。

中国作为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提出2016年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主题是共同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事实上，2016年G20中国峰会是以中国为首的全球性大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全面会商与综合诊治，标志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中博弈地位和话语权的明显提升。

创 新

创新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周期性政策可以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但难以推动持久增长。二十国集团应当倡导创新驱动发展，鼓励包括科学技术、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在内的全面创新，打造世界经济新增长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成功经验是全球经济变革的经典教材，其中创新战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首要战略。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悄然改变，其中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效果尤为突出，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核心动力。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创新力最突出的国家，从2009年的《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到2011年的《美国创新战略：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与繁荣》，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始终将创新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2015年10月，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与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新版《美国创新战略》，奥巴马政府为此最新推出了三个创新战略计划，包括：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和持续经济增长、推动国家优先领域突破及建设创新型政府服务大众。当前全球的新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二十国集团应该充分发挥新技术、新要素和新工业组织模式在促进国内生产和创造就业中的作用，同时加强二十国集团在工业发展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合作，实现共同增长。

改 革

改革是世界经济走出低迷的必由路径。中方主席声明指出：二十国集团应当向国际经济合作要活力，向各自国内结构改革要活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高效的方向发展，提高各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质量效益，让世界经济的潜能充分释放。当前，“结构改革”一词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愈发突出，在世界经济竞技场上，经济活力较强的国家无一不得益于坚定的结构性改革。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结构性改革一直推进，金融改革和医疗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同时大力加强实体经济，呼唤实体经济的回归，但是实施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重大债务性改革还面临重重阻力。日本一直大力推销“安倍经济学”，其中核心内容也在结构改革，希望通过一系列政策创新，促进民间投资，让生产率进步支撑日本的长期持续复苏。但是，日本改革遭遇到国内利益团体的强大阻力，结构改革的坚冰至今难破，经济低迷不振。欧盟层面的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推动单一市场建设，实现欧盟经济现代化，提高欧盟竞争力和对投资的吸引力，改革重点包括取消能源、电信、交通等行业和货物与服务单一市场的现有规制性和非规制性壁垒。当前从短期看，希腊债务危机对欧盟全局的影响有限，欧洲经济有望改善；而从长期看，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实现均衡、可持续增长的目标仍然不明朗。

2016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印度新德里说，亚洲已占全世界经济的40%，且在未来4年内将贡献全球经济成长近2/3。亚洲国家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所以结构性改革将是关键。在中国，供给侧改革是全球经济的热门话题之一，已经成为2016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路标”。中国发起供给侧改革将对世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为其他国家提供非常有益的借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将进一步融入全球经贸体系，还将成为促进经济秩序合理化、公平化的积极因素，向世界传递中国经济的正能量。

协 同

协同是世界经济逐步向好的基本保障。世界经济的活力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所有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历程一再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我们的必然选择。《第三次工业革命》作者杰里米·里夫金的最新作品《零成本社会》一书预言：一种新的经济体系正在登上世界舞台。自从19世纪初期以来，协同共享是第一个生根的新经济范式。21世纪上半叶，协同共享伴随着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并且已经开始改变我们组织经济生活的方式，它极大地缩小了收入差距，实现了全球经济民主化。

二十国集团成员贸易额占全球近80%，有义务也有能力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2015年11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我们应该根据各自国情采取必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国际市场稳定。主要发达经济体要努力巩固和扩大复苏势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要努力克服下行风险和压力，保持和恢复增长。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大国，则更需要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充分考虑对他国的影响，提高透明度。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推动各方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增进各国政策协同效应，减少负面外溢影响，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促进投资和消费，共同提振世界经济增长。

目前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已连续三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措施显著抬头。二十国集团高度重视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挑战，强调继续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在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的主渠道地位，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为整个世界，尤其是亚洲、非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亚洲、非洲各个国家能够形成资源、基础设施的互补，进而得到共同发展。

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求各国共同努力消除极端贫困，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缩小南北发展差距，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目前，全球仍有8亿多贫困人口，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二十国集团应加大对减贫工作的投入，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提升本国发展能力，改善外部发展环境，携手加快全球减贫进程。中国在二十国中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

腐败危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需要全球社会协同应对。2016年G20中国峰会将积极促成二十国集团成员在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特别是各成员应当继续积极落实跨年度反腐败行动计划，加强拒绝避风港、腐败资产返还、腐败人员遣返等领域务实合作，并将其作为二十国集团未来工作重点之一。

高度重视企业海外并购风险

□ 霍建国

随着中国经济总体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上升，近年来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并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继2015年中国海外投资规模突破1180亿美元之后，2016年伊始，海外兼并收购又呈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据报道，仅前两个月中国企业就先后宣布了约1130亿美元的并购标的，几乎接近了去年全年的海外投资规模。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有中国化工集团投资460亿美元收购瑞士的种子与化工集团先正达公司，该公司目前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转基因种子公司，虽在瑞士注册，但其主要业务均同美国市场有关。此项收购案已经引起美方各界高度关注。同时备受关注的还有中国安邦保险集团对美国喜达屋集团的收购案。此外海尔集团斥资54亿美元收购美国通用电器下属的电器业务；大连万达集团斥资35亿美元收购美国传奇影业。仅年初以来，中资在美收购案比去年同期就增长了300%以上，这一系列的收购在国际市场上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中国企业海外兼并的主要类型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投资理论分析，认为人均收入超过8000美元之后，一国的资本流出将超过资本净流入并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而2015年中国人均收入已超过8000美元。从投资结构看，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领域正在由矿山能源开采逐步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向，而近期更呈现了多元化发展趋势。美国市场的反应是中国目前在美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八大领域包括酒店度假村、名牌豪华酒店、洗碗机和咖啡机生产领域、重型机械、好莱坞制作商、软件分销商、证券交易所及网络游戏等，这些在美国市场发展十分成熟的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标的。鉴于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的艰难阶段，从中国企业发展的需要看，企业的海外兼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通过兼并收购海外发展成熟的服务业，中国企业可以直接进入该行业的经营领域，继承并沿用原有的销售渠道和网络并能保持一定的盈利水平。二是通过兼并收购生产型企业，可以学习掌握原有企业的产品研发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并可以掌握该企业现有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借用原有的销售渠道和网络，扩大企业的规模和盈利水平。三是通过兼并收购可以和国内企业的发展融会贯通，通过市场的双向传导作用或把国外成熟的经营理念和模式引入国内，拓展新的盈利模式，同时可以发挥国内企业的制造、组装能力，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销售份额。四是通过兼并收购可以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能力和水平，对于做大做强企业加快形成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认识误区

从目前中国企业短期内海外并购快速发展的原因分析，不排除存在以下几方面潜在的动因及认识上的误区。

缺乏对国外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理解和把握，盲目乐观。以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为例，目前，多数企业认为美国经济正处于强势复苏阶段，此时收购美国的一些具有成熟商业模式的服务行业，可以带来稳定的投资回报。这是由于中美文化差异和感性认识的不足，而导致的对美国经济的分析和判断不全面。在这种误区下，中国企业海外收购从长远发展看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一是一旦遇到新的经济萧条或市场震荡，企业经营会遇到困难或亏损；二是中外文化差异可能导致经营理念和发展模式产生分歧或矛盾，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和效益。

对金融信贷高杠杆的风险认识不足。中国企业海外收购中部分投资者采用大量的银行贷款或投资基金进行支付。其中一些企业的贷款投入高达90%。高负债率增加了企业运营风险。同时，相当一部分企业对投资基金积极参与的风险认识不足，对投入产生的测算也不够严谨，有的甚至对银行还款的方案都不了解，这些问题都构成了潜在的企业负债风险。

受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心理驱动。自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由于受到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和美元快速升值的双重影响和冲击，人们的预期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币一度面临明显的贬值压力。一些企业对人民币未来发展心有疑虑，担心人民币会持续贬值，所以抢在人民币贬值之前大规模投资海外市场，以期获取汇率波动好处或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几点建议

针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海外并购浪潮，有关主管部门应加强两方面工作：一方面对企业投资的热情充分肯定，有关主管部门应继续提供必要的便利化服务和政策支持；另一发面应加大多方面的信息发布与服务，及时向企业发布风险提示和引导，提醒企业树立风险意识，确保投资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企业要关注并学会把握和驾驭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目前全球经济仍处于不均衡复苏阶段，市场波动和震荡十分剧烈，发达国家仍未最终摆脱危机束缚。美国经济虽率先复苏，但也存在众多深层次的矛盾，特别是金融资产泡沫和企业债务风险仍是困扰美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中国的投资企业一定要全面了解投资目的国的政治、法律、经济状况，并对这些发展变化有准确的判断以避免大规模投资后，经济形势恶化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企业必须制定完整的投资计划。中国企业一旦决定参与海外投资项目，必须要有一个统筹的考虑。首先要有明确的发展思路，把握好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经营主业。在进入市场前，应制定详尽的产品战略和市场战略，并要经过充分的论证。其次在具体项目启动前要做好可研报告，如有困难应委托专业咨询机构完成。

控股经营或以较少的投资实现控股的目的。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最大股东控股是很正常的情况。所以中国企业在海外兼并过程中，应尽量避免全额收购，可以采取分步兼并收购的方法。如先入股一定的比例，待经营的前景比较明朗时再进行增资控股。对此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提供了有效的经验，数据显示，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外商在华投资的70%是以合资的形式进行的，此后控股和独资的形式才逐渐有所上升。而且在投资进入市场的初始阶段，当地合作方的选择也是十分重要的。

与当地企业密切合作。海外投资在起步阶段最好先以合资的形式为主，学会与当地企业分工合作，并且要慎重选择好合作伙伴，特别是在一些敏感领域的投资，如果没有当地有影响力合作伙伴的配合是十分复杂和艰难的，有时甚至会付出较大的代价。此外无论在海外经营独资企业还是合资企业，都要深入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文化风俗习惯，并且要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严格依法办事，不能有侥幸心理。在这一点上要密切与当地合作伙伴沟通合作，尽量采取属地化管理的模式，加快融入当地社会，树立良好企业形象。

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在海外投资兼并过程中，主要应注意两方面风险，即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由于不了解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和财税制度所导致的经营困难或财产损失属于外部风险；由于人员安排不当或主要负责人水平和能力有限所导致的经营亏损属于内部风险。此外在当前形势下，在海外兼并收购的过程中应尽量避免杠杆过大操作，特别是对于有些负债很高的一些企业，更要严格限制超规模贷款收购的做法，应鼓励采取多渠道融资的方法，避免因企业遇到债务问题后直接对银行造成影响。

国内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重大项目的关注和跟踪。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强调简政放权，减少审批，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超过一定规模的重大投资项目一般在海外都会引起强烈反响。这些项目的进展不可避免要经历复杂的程序，有时还会引发各种矛盾。如果处理得不好，中国的投资形象就会受到影响。政府主管部门有必要对这些项目进行了解和跟踪，以便在发生矛盾时及时出面协调或推动高层出面疏通，以更好地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大型企业并购的后续跟踪和监管，特别是对于企业并购后的效果和效益也要有一定的跟踪。要善于总结经验，及时作出一些必要的政策调整和完善，以防止企业陷入深度的投资风险。

战略视角

外国政党研究

欧洲政党危机重重

□ 柴宝勇

在世界政党政治格局中，欧洲各国的政党体制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党组阁制闻名于世。如今，欧洲一些国家政党却身中“选举诅咒”，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斯洛伐克等国议会选举中，大党屡受挫败而四分五裂，极端主义的小党则趁机扩张，其政党政治正在迈向艰难的试探性谈判的政治停滞和政策摇摆期。这一现象出现的首要原因是欧洲的经济问题和移民政策屡失民心，财政困境与政治不稳定形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恶性循环。另外，在欧盟新成员国中，由于受政治转型中政治不稳定，政党力量分散等因素的影响，选民往往也不完全按照经济成就来对政党进行投票。此外，下列因素也不容忽视。

文化认同差异导致对现有政党认同不足

美国政治文化学家英格尔哈特认为，欧洲选民的政治偏好已经呈现从老一代人的“物质主义”向新一代展现个性的“后物质主义”的整体转变，文化认同差异的价值观变化将主导欧洲政党的投票行为。

在阶级冲突与经济问题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传统政党的沉浮与其执政绩效密切相关。但是随着西方社会的逐步发展，以文化和生活质量问题为基础的新一代选民的认同坐标轴已经形成。现有的政党还未能完全适应这一变化，当代欧洲各国的政党结构也未能与时俱进地充分反映出当代最紧迫的问题。因而，那些战后出生的人认同现有政党的动力不足。而且，在后现代展现个性的多元文化中，对权威的尊重天然地减少，更加强调自我感受和价值多元，这与日趋精英化、专业化的政党产生了很强的张力。

现代社会也是信息社会，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多元传播技术被广泛应用，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是即时信息的接受者，这就打破了以前政党和领袖垄断信息、霸占媒体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网络的民意空间在信息传递、信息分享和舆论营造方面甚至比传统精英主导的舆论体系传播更加迅捷、影响更为广泛。在地方选举中击败德国基民盟的德国选择党在竞选中就不断发起对传统媒体的攻击，甚至公开宣称媒体和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狼狈为奸，“出卖德国利益”。其义正严辞，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利用新媒体和网络媒体为自己造势。

选民对政党政治总体不信任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欧洲政党政治的发展史，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欧洲学术界就在大量地讨论“民主赤字”和“政党衰落”问题。我们发现，当代欧洲政党在近几十年里丧失了很多功能：国家与社会的交流是通过大众媒体，而非政党的刊物；社会与国家的交流是通过民意测验甚至全民公决，而非政党集会；政治社会化绝大多数是在国家的教育体制中进行，而非在政党的暑期学校或青年俱乐部中进行；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日益被利益集团、政策小组、智囊团或者专门调查委员会来控制；新社会运动和网络民主蓬勃发展，而政党自身的党员人数却日益下降，公众对政党的信任程度下降。这实际上不是对某个政党认同的危机，而是对政党政治的总体不信任。

这种政党政治危机的原因，从政党功能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体现出一种功能的转换：政党以原来的利益代表为主转向控制政府为主，即政党越来越脱离社会而融入国家。西方学者卡茨指出，“现在的政党已经不仅仅是沟通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桥梁，而是被国家吸收……变成了半国家的机构”。为此，他提出警告：这种情况可能阻碍或限制社会对政府和国家做出反馈，最终导致国家因内部压力过大而崩溃，或者导致各种反对意见聚集起来，直到找到一个可怕的宣泄口。

从更深层次的政党与民主的关系来看，如果我们把政党政治看成是半直接民主的产物，那么当前政党认同的危机就是现代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的风起云涌、价值观念的丰富多彩、网络民主的直接参与这三种因素综合作用对政党政治所形成的根本性挑战。法国学者贝尔通西尼认为，“在国家和欧洲遭遇认同危机期间，传统政党未能让民众对它们产生新的认同。”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院教授斯特凡诺·巴尔托利尼等对政党政治的危机更为悲观，他们虽然认为欧洲政党还没有走到被其它民主工具替代的境地，但如果不能审慎处理利益代表与控制政府的关系，政党政治的衰落必将不可避免，“即使没有替代性选择，也不能保证政党未来的成功，甚至生存。政党可能会沦为一种标签，仅仅反映了独立程度不同的政治企业家之间派系的庇护性竞争，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试图使用一些方式和资源以获得选民的支持，而这些方式和资源是政党所不能得到和控制的。”

当前欧洲的政党政治再次演绎了这种民主转型中传统政党政治走向衰落的内在逻辑。而政党如何走出困境，其不仅要关注本国的短期经济绩效问题，更要关注普遍的政党认同不足问题。在后现代社会，如果政党能够更加审慎地对待利益代表问题，更加重视文化认同问题，更加灵活巧妙地运用新媒体工具，或许这些问题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解决。